

湖北试点撤销乡镇政协

日前湖北省进行一场关于乡镇机构的试点改革,被人们惯常地列在“四大班子”之中的政协在乡镇撤销,政协工作明确一位负责同志兼管。整个撤销过程在平静中完成。

其实对于乡镇一级的政协职能,一直都存在质疑的声音:“乡镇基本没有民主党派,就算有知识界、文化界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基本上没有统战的工作,设立政协,还有这个必要吗?”与此同时,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并没有要求在乡镇一级设立政协机构。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既没有相关根据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机构能够出现并大量存在呢?

事实上,这是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因人生职”的一个现象。政协在乡镇的组织机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以试点县市之一监利县为例,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只有县里有政协。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原来的十个大区,共有30余名正科级干部,扩充后翻了一番,变成了六七十个。其后干部越来越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多地方在那时搭起了乡镇“四大家”的班子,乡镇一级的政协机构被设立,一些科级干部得以安置。

2003年湖北省下发17号文件,正式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它试图解决很大程度靠农民供养的乡镇政权,在税费改革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压缩人员和机构。改革选取了7个试点县市重点推进,一共有“八大举措”,而其中“撤销乡镇政协”因其涉及基层政治架构的变革而受到媒体关注。(据《南方周末》)

我国的养老模式居家为主

我国要建立怎样的养老模式呢?日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阎青春概括了三句话:以家庭服务保障为基础,以社区照顾为依托,以机构供养为补充。

他解释道:“养老回归家庭是趋势,从国际的普遍状况来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以社区为单位的照顾同样重要,老人们在自己的社区或是在家里就能享受服务,更具人性化。机构养老虽是一种补充,也不可或缺。”

阎青春介绍说,西方发达国家大体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老龄社会初期,国家大规模兴办机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意识到机构养老对老人的心理可能造成伤害,养老要回归家庭,但不能一下子回归,就先回到社区;最后回归以家庭为主的养老体系。(据《人民日报》)

偏僻小村走出21位百万富翁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通往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都会“挤”进约50辆挂着上海牌照的各色小轿车,缓缓地驶向镇里最偏僻的小村——塘拐村。开着小轿车的都是回家过年的昔日塘拐“小木匠”——如今他们是上海的装潢公司老板。一个只有2000多人的偏僻小村,在不到15年间走出了21位“打工”百万富翁。

“塘拐村过去是乐桥一带最穷的村之一!”说起塘拐村,乐桥镇党委副书记唐启银这样介绍道。穷则思变,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塘拐村的多名年轻人拿起了斧头、锯子干起了木匠。

“当时木匠每年可以挣2000元左右。可这样仍很难改变穷乡僻壤的面貌。”塘拐村党支部书记张敦九说。1992年3月,张敦九决定和村委会吴成秀一道到大上海“探深路”,张敦九发现:上海的一幢幢高楼盖好后都需要装修,开个装潢公司肯定“来钱”。

从上海回到村里后,张敦九找到了初中毕业后在村里“游手好闲”的张厚祥。张敦九说:“我们观察到他有一定文化,人很机警,一旦做起事情来有一定的魄力,所以我们找到了他。”

张厚祥向亲戚朋友筹措了一部分钱款,差缺的部分,村里帮他从当地信用社贷了一部分。就这样,塘拐村的第一个公司在上海开业了。果然,第一年,张厚祥的公司就赚了24万元。好消息在塘拐很快传开了,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又一个塘拐的年轻人开始创业。

“塘拐人的创业成功给了周边村民重要的启示。”唐启银说,“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有关部门一定要学会引导,将农民的自发打工行为引导为自觉创业行为,形成适宜农村青年创业的‘小气候’,同时在他们创业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要有集体的力量撑腰,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百万富翁’出现。”

(据《中国青年报》)

清明习俗为何未遭没落

清明习俗并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传统节日那样面临没落的命运。

这是个叫人哀伤的节日,全世界的中国人为了这个日子,蜂拥而至先人灵前,只为给自己的列祖列宗、挚爱亲朋烧把纸,上炷香。

近些年,清明习俗不但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传统节日那样面临没落的命运,反而出现了文化复归的趋势,各地的祭扫大军呈迅速上升势头。2004年清明期间,上海约有650万名市民外出扫墓,祭扫车辆27万余辆。上海媒体估计2005年清明有750万人出动扫墓。

不只是上海,在北京、杭州、广州……在一切华人聚集的地方,清明祭扫的蜂拥人群,袅袅香烟都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缅怀中缓解社会压力

“清明节一般不放假,但我妈妈总要找一个周末,去给外婆公公上坟。”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多年的小周,对妈妈的行动表示理解。“人去世了,不管相不相信有灵魂存在,都应该以此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毕竟是一种怀念。”

“一到过年过节,我妈就经常梦到去世的亲戚穿得很少,屋子漏雨什么的,所以特别注意按时给他们扫墓,送点钱花。”祖籍广东的小朱,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维系他们亲情的,是节日的祭祀活动。“虽然知道没有阴间,但还是希望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样自己心理上比较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涛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经济发展很快,但文化建设没有同步发展,社会上有人文精神失落的倾向。清明节俗的兴盛,宣扬了中国传统中的孝道伦理,强调了亲人间的感情联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促进了社会上人文精神的建设和弘扬。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教授说,高节奏的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和复杂,斗争频繁,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容易让人身心疲惫,所以人们更加重视亲人之间的关系,渴望祖先的佑护。“中国人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社会,希望借祖辈的力量在陌生的社会中取得成功。”胡星斗教授说。

寄托世俗的欲望

“我们小时候过清明节,就是小孩们穿戴着整整齐齐的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一起去烈士纪念碑扫墓。”已经30岁的警察小杨回忆道,“因为烈士纪念碑就在公园里,所以我们扫好了墓就玩,所以清明节跟春游一样。”

黄涛说,清明节习俗的主要内容扫墓与春游两大项目中,现代人主要关注清明节扫墓的习俗,春游节俗已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全国各地的学校或单位常在清明节组织人们去革命烈士陵园扫墓,缅怀先烈事迹。但现在革命

烈士陵园荒芜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

“中华民族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过去的事物,可能因为是农业国,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对过去的事物极为依恋,而这就体现在了祭祖上。但是中华民族又是一个非常世俗的民族,对钱财非常重视,往往在祭祖的活动中寄托了‘福’、‘禄’、‘寿’这样的极其世俗的价值观,而这就体现在了祭祖活动中的各种仪式上。”

据《商旅报》报道,除了纸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旧三件”和电脑、轿车、别墅“新三件”外,纸私人医生、保安、高尔夫球场,甚至连纸“伟哥”、“安全套”也成为人们为先人准备的祭品,后人对先人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在某些地方,人们甚至给先人准备了纸保镖、纸保姆、纸小姐和纸二奶。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城市地区清明扫墓的盛况,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趋势。而祭祖不仅成了人们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敬爱或怀念,寄托自己的亲情的途径,也成了巩固亲情、联络和团结族人,甚至招商引资的方式。

让活着的人安心

为什么在拥有同样的中华文化,而工业文明比较发达的香港、台湾地区,风水、迷信活动比大陆更加“兴盛”?胡星斗认为,其实这些活动,都包含着现实的追求,实际上算是世俗的活动。

相对现实的事物,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一些迷信,来释放身心的压力和能量,一方面逃避现实,一方面幻想可以由此获得“超自然”的力量。

“困扰西方人的,是自然界的神秘,而困扰东方人的,是人世命运的变幻。”胡星斗说。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在生命转瞬即逝的时候,我们纪念那些逝去的人们,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安心。

(据《瞭望东方周刊》)

国有林场惊现“皇帝墓”

位于小兴安岭西南坡的黑龙江省铁力市东升林场是有林场,然而在林场茂密的森林中,居然兴建了一座名叫皇龙陵园的公墓,而陵园的建设者、所有者不是别人,正是黑龙江省铁力市林业局。截至目前,皇龙陵园里的墓穴已经售出100多座。一些据说请风水先生看过的,能出皇帝的墓地也在准备建造中。铁力市林业局深知这些行为见不得光,因此市林业局甚至拿出数万元企图对记者进行贿赂,遭到记者的断然拒绝。

更让人开眼的是,为了实现“双赢”,当地民政局、林业局甚至干起了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和“监守自盗”的勾当:皇龙陵园手续不齐全,铁力市林业局便将陵园占用的次生林地以“荒山荒地”的名义获得了省林业厅的批准,但是并没有得到省民政部门的批准。为修陵园,民政局非但不予监管,还参与到陵园的经营活动中,甚至违法挪用扶贫专项款。

(据央视)

女性生育权应由社会共同保障

2004年8月初,刚刚大学毕业的唐女士在老家办理结婚登记后,进入商务部人事教育劳动司办公室工作。在11月的一次体检中,她被检查出已怀孕,在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把自己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多次找她谈话,明确表示,她要么打掉孩子,要么离开商务部。

2004年12月17日上午,办公室主任通知唐女士说司里已决定取消她的录用资格。

其实,女性因怀孕原因不被用人单位录用的事情时有发生,对怀孕女性的求职给予限制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一些用人单位屡屡对怀孕女性进行限制,是因为考虑到生育子女要离岗,抚养孩子将影响到工作的连续性,会增加成本支出。尽管社会对用人单位这种追求用人利益最大化的不道德表现可以谴责,但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无不妥,提出这样的招聘条件也实属无奈。

考虑到生育是人类个体一生中对社会、家庭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总要去承担的,所以女性员工因生育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一种整体需求导致的。

有关法规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要承担孕期女性的保障责任,但女性生育权保护是全社会受益,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女性孕期的责任显然不妥当的。

因此我们应设计一个制度,设法让招收并负担女职工生育的用人单位获得一定的社会补偿,调动其吸纳并保障育龄女性的积极性,制定一些政策来鼓励用人单位吸纳这些孕期女性,使用人单位不再拒绝孕期女性。

(据《羊城晚报》)

我国公安队伍将扩编

2005年1月27日,四川省公安厅宣布,从2005年起,四川省公安系统将连续5年“招兵买马”,每年新增警力5000名。而在距四川省公安厅宣布扩编的10天前,重庆市公安局长朱明国宣布,重庆市准备新增1万名警力。

警力奇窘,远不只川、渝两地为然,显然,我国公安队伍将扩编。统计表明,中国正以11名警察/万人这样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警力,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个犯罪高峰。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四次犯罪高峰期,发生大案10万起,是前三次高峰期刑事案件的2倍;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涌来并持续到现在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发案率上升到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形成的公安机关体制是对户口的掌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勇说,“任何的犯罪都可以通过户口和组织进行追踪。而现在这种手段已经显得过时并且失效了。”市场经济要求公安机关以新的方式取代过去被动接受报案的公安运作体制。王勇说,中国公安机关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发现,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将警力放置在街面上是减少犯罪发生的最好方式。

(据《羊城晚报》)

超高建筑存在严重安全问题

一旦出问题楼越高越可怕

如果你在大楼第63层工作,离地面200米,大楼突然发生火灾,你该怎么办?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专家组专家金磊说,很多在超高层建筑上班的人,几乎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却日益威胁着城市安全。

根据规定,高于24米的建筑属于高层建筑,高于100米的建筑属于超高层建筑。金磊说,城市安全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让一名身强力壮的消防员从第33层跑到第1层,用了35分钟。如果是一名身体素质一般的工作人员或老人、小孩,所需时间肯定翻番。而火借风势,30秒内就可以从第1层到达第33层。这样算来,人们跑到楼下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正是担心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2002年7月14日揭晓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已经没有了数百米的超高层双塔建筑。

金磊说,这是规划师和建筑师有了安全意识后,冷静思考做出的理性决定。

不可挽回的城市景观

对北京城区的规划,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提出建议,以北京西部的五棵松为中心,建立新北京城,在新城区盖高楼,老北京城则以景观保护为主。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现在的北京现代化高楼和四合院混杂,摩天大楼和古城遗迹穿插,为了盖高楼而强行拆迁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建筑。

建筑专家建议立法削高楼

广州高楼密集程度居世界前列,广州市民主促进会在日前结束的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呼吁立法限制市区高层建筑。

调查显示,广州市现有18层以上的高楼7000多栋,居世界前

列。其中,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有360多栋,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栋。

高楼造成了高容积率,高容积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口过度集中,绿化空间被占据,人均绿地面积减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广州去年灰霾天气高达144天,过密、过多的高楼群难辞其咎。而且,城区高楼一般都建在路边,既不利于交通,也容易形成两道回音墙,造成噪音污染。

另外,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层楼宇空置现象相当严重,而日常管理开支又十分高昂,一批超高层建筑几乎已经被庞大的开支压垮。建筑高度超过300米后,建筑成本很高,同时还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内部交通问题,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节约土地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基本上不建高楼了。目前国内的上海、南京等地也都相继立法,限制市区的高层建筑。

(据《中国青年报》)

硕士公务员被逼下岗惊动总理

他叫曹再学,今年29岁,是一名拥有采矿及矿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高学历人才,2003年他被阜新市人事局招录为公务员并分配到该市国土资源局工作。

莫名之被取消编制无限期下岗

2003年4月9日,曹再学在国土资源局完成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国土资源局的人事领导到辽工大全面了解了曹再学的成绩及表现之后,双方签订了《全国研究生就业协议书》。

2003年12月31日,在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了半年的他才领到了第一笔工资2400元。

该局机关党委书记刘铁军告诉他:“由于你没有人事关系,每月400元已经是照顾你了!”曹再学对此虽难以理解,但没有任何办法。

到了2004年1月16日,刘铁军通知曹再学:“经国土局党委研究决定,推翻了市人事局批准你的公务员编制,原则同意你进入自筹自支的事业编制,并超编运行,重新办理人事关系。”刘铁军同时强调:这项决议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老实人被潜规则算了旧账

2003年8月10日下午,刘铁军将曹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曹回忆说,刘当时十分生气地训斥他说:“谁进国土资源局都得给三五万元,给人事局一两万元;你怎么进来我就怎么将你弄出去,即使你正式进来了,我也照样将你弄出去!”当时在场的还有人事副科长刘金利。

总理、省长批示终于化解刁难

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曹再学只好依照程序,向省政府、国务院信访办递交申诉状。

去年端午节那天,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国务院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材料已经分别转交到有关部门,并转告曹再学要好好工作,有什么问题及时向组织反映。

刘金利也承认他们先后接到了温家宝总理和张文岳省长的批示,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恢复曹再学的公务员身份,补发工资。

可是,曹再学在这里会有好日子过吗?他所学到的知识还能用上吗?

(据《时代商报》)

孙科晚年的艰辛岁月

1949年7月,孙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后,意气消沉,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北,没有通知孙科赴台。孙科意欲申请赴美,但台湾当局不给他发放护照,无奈中只得暂住香港。

孙科在香港居留期间,每天都有滞留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孙科每以10元港币打发这些昔日的军政人员,后因人数日益增多,乃改为5元,但前来借钱的人仍持续不断,遂决定尽速离开香港。孙科刚到香港时,即向港英当局申请出国护照,但在1949—1950年间,孙科却为一私人之事所困。广东籍某女子声称与孙有染,向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控告孙科遗弃,要求孙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此女子得到孙科政敌的支持,其目的是阻止孙科前往台湾。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到1950年春,香港法院判决孙科胜诉,他才得以回国。

1950年秋,孙科携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暂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晚年流亡海外的岁月,是年孙科60岁。

孙科虽流亡海外,但起初生活却颇为优渥。1950年他寓居巴黎后,养病之余,经常游历